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经世文选译

● 林庆元等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经世文选译

林庆元等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特约编辑：成采白

责任编辑：段志洪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经世文选译

林庆元等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5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懑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鸷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经世思潮，也称实学思潮。它产生于明代以至清初，而发展于嘉道年间。要说清楚经世思潮，就得先介绍一下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学说——儒学。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他一生重视教育，并为了把古代的贵族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设学授徒，且整理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即所谓“六经”的古代文化资料，成为二千多年来知识分子必读的经典。其后，他的一些学生也相继讲学，逐渐形成“儒家”学派。然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其中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主张“民本”。汉代，董仲舒以注经的形式，融入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宣扬“三纲五常”理论，思想界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到了宋明时代，理论家也借注经的形式，发展了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人的自我完善、内心修养提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儒、道、佛为特征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也称宋学、理学。朱熹为正统派理学之集大成者。理学成为支配

中国思想界的正统学说。清初，康熙皇帝由于统治的需要，进一步把理学捧上正统官学的位置，使之成为红极一时的统治思想。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造成了明王朝的衰落。于是当时有识之士开始探讨这种危机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社会危机的造成原因之一是由于理学的空疏和迂阔学风。因此兴起了批判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提倡“崇实黜虚”的精神和学风。这一派的具体主张表现为：1. 批判精神；2. 经世思想；3. 科学精神和启蒙意识。它一方面批判理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经世”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1613—1682）的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的学问，可以归结为“崇实致用”，对心学和理学持批判的态度。他讥理学为“禅学”，是“内释而外吾儒之学”，认为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他对转变明末清初的空疏学风，有深远的影响，成为“经世致用”的先驱。黄宗羲（1610—1695）提出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的主张，并毕生身体力行。他重视研究文学、经学、天文、历算、音律学等实际学问。他敢于大胆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君臣共治”、“工商皆本”等启蒙思想，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先驱。王夫之（1619—1692）提出“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之实”，并对宋、明理学作了批判和总结。他从研究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实学中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成为经世思潮的哲学基础。此外，明末清初还产生了一批如徐光启、方以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在中西自然科学交汇的时代，他们提出研究“象数之学”，认为数学、几何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工具。徐光启还译有《几何原本》，并编《农政全书》。后

者已开始使用实验方法来进行科研。总之，他“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另一位科学家方以智则十分重视“原则”，提倡实证的科学方法。这些从另一个方面，构成了实学思潮的重要内容。

经世思潮发展的同时，到康乾时期，考据学也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戴震、惠栋、阮元为其代表。这时的朴学（考据学）与清初顾炎武的实学已不同。乾嘉考据学是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免遭文字狱之祸的产物。他们虽然重视史实，在鉴别真伪、保存古籍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这个学派因不问政治，醉心繁琐考据而逐渐偏枯。

道光以后，由于乾嘉“盛世”的迅速消失，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上西方开始入侵，使有识之士从“皓首穷经”书斋里惊醒过来，逐渐地认识到“衰世”的到来，进一步反思汉学的“短钉琐屑”，宋学的空疏无用。于是，士林风气又为之一变；由古文经学走向今文经学，由考据走向“经世致用”。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及其学生龚自珍、魏源则代表了这一时代学风的转变。如果说龚自珍“经世致用”思想的特色在于“讥切时政、诋诽专制”，那么魏源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则在于“兴利除弊”。而后者的思想，已超过了经世实学的水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的思想开启了后来的洋务思潮。因此，龚、魏既是明清实学的继承发展者，又是近代新学的先驱。

道光年间，经世思潮再度高昂，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嘉庆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如人口倍增而土地相对减少，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赋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吏治黑暗，贿赂公行等等，都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白莲教、天理教和天地会等秘密

结社为核心的农民起义。“乾嘉盛世”由此迅速走向衰落。一些封建士大夫为挽救封建制度，寻求对策，便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落后，促使一些士大夫去探讨中国何以弱，西方何以强的原因，从而产生了“睁眼看世界”的新观念、新思想。这些新观念、新思想，便构成近代经世思潮的主要内容。

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潮，是明清实学思潮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除了上述面向世界的新思潮外，就学派而言，则出现了汉、宋调和或融合的趋势。如曾国藩原来崇尚理学，后来也主张汉、宋兼蓄，提倡义理、考据、词章、经济溶于一炉的“经世之学”。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此外，还有像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兆洛、包世臣、姚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这样一批经世派。道光六年，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标志经世思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书分学术、诏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五目，共120卷，是一部断代经世论文总集。大部分是有关漕运、盐政、荒政、钱币、水利及军事方面的内容，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文、奏疏、书札等而成，贯串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大，为近代多种经世文集开了风气。

这些经世派，已不像宋学家那样，排斥异己，独尊儒术。相反，他们兼收并蓄，对各个学派加以包容。他们不仅研究儒家，而且也研究诸子百家，注重的不但是学术理论，还主张“通经致用”，用经学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1) 由于他们要求改革时弊，便不能不对僵化的保守的正统理学进行清算和批判，从而使人们扩大研究视野，转变学术风气。如龚自珍在深刻揭露封建政治弊病的同时，还对儒学一尊的地位提出挑战，公开宣称：“兰台序九流，儒学但居一”，并猛烈地抨击理学使人“疲精神、耗目力”，是“无用之学”，讥汉学为“琐碎钁钉”。显然，他认为学术风气必须抛弃空疏与繁琐，方有益于世。所以他宣称：“好杂家之容”，提倡“东西南北之学”，研究边疆史。又如包世臣，更明确地斥责宋学只知空谈性命，“鄙夷田事”。这些呐喊，对转移社会学风，使之趋于务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思想界包容其他学说（包括西学）开辟了道路。

(2) 宣扬进化的历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模糊地认识到，变化是一种历史趋势，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根据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向清政府提出“更法”，指出清政府不能“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议”，否则就可能改朝换代。魏源则更进一步反复证明历史变革是不能逆转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还于无甲兵”。但他认为，要变的只是器，而“其不变者道而已”。即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封建伦理及秩序不能变。这种理论即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端。

(3)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观点。历来理学家宣称不言利、只言义，以维护其剥削制度，把言利的市民看作小人。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压抑。而龚自珍则公开宣扬“言私”、“言利”、“言富”。魏源则提出保护“有田之富民”与“无田之富民”，主张“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此外，还提出在河工、漕运、盐政、农政方面的兴利除弊。这一切，都对封建主义价值

观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洋务运动做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4) 重视科学研究和实验。经世派反对唯儒家书籍是尊，不薄杂家。林则徐十分重视“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而且研究《农政全书》、《潞水客谈》等书，重视农学，提倡水利，进行科学实验。魏源的《海国图志》还特地辑录了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及军事科学知识的有关文章。经世思潮为科学发展创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知识分子从儒家的典籍里摆脱出来，扩大了学术视野，培育了一批近代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詹天佑等。

(5) 学习西方。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近代经世思潮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高墙，这是几千年来一大变局。在这形势面前，经世派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开始从注重“时务”扩大到注重“夷务”。为了反抗外国侵略的需要，他们留心了解外国事务，进而学习“洋务”。林则徐在广州为此编译《四洲志》。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派学西方思想的具体和重要表现。到60年代，经世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冯桂芬撰写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了“采西学议”，比以往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有更具体的学西方的议论。经世派事实上是学西方的倡导者和开风气者，经世之学包融了“洋务”和西学。

在“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观念指导下，了解西方史地，成为近代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体现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风气。接着，魏源编《海国图志》，这是当

时由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一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书。该书不但对开拓中国人的眼界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人士所推崇。稍后，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畬也编有《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南亚的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详加记述。此外，面对列强对中国边疆扩张的形势，不少经世派重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他们揭露列强对边疆的蚕食，呼吁加强边疆设防。姚莹的《康輶纪行》一书，考察了我国西藏地区的史地和社会宗教风俗，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使经世思潮带有更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

(6) “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我国一种优秀的思想传统。《尚书》里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及历代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进入近代，民本思想也为经世派所继承。林则徐像历史上的一些思想家一样，把人民当作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重视民心向背，重视民智，爱惜民力。虽然不能说经世派是“民本”思想的唯一继承者，但应当承认，一些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比较重视民心，重视民力。因而，主张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团结民心”，实行一些有利于民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中，也主张“民心可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或利用民众力量抵抗外来侵略。

经世之学在近代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应该说，它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特定文化形态，既继承了古代儒学经世的传统，又包含了近代某些文化，如西学和洋务。经世派从注重“时务”到注重“夷务”，是经世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所以，经世思潮是从传统文化过渡到近代文化的桥梁。因为它本质上是一

种改革思潮，较为务实，所以容易抛弃门户之见及“夷夏之防”。“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正是反映经世思潮的特点。一些曾经调和汉、宋，接受经世思潮者如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焘，到60年代成为洋务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批人与道光年间的林则徐、魏源、贺长龄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冯桂芬（1809—1874）的思想则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冯是林则徐的门生，1862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他在这期间写的文章，收入《校邠庐抗议》和《显志堂稿》，对清政府的漕运、盐政、农政均提出改革主张，特别是《采西学议》，更具有洋务思潮的色彩。他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事实上成为洋务派活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冯桂芬是从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向洋务派的过渡人物。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他的洋务思想更加深刻地打上经世思想的烙印。少年时，左宗棠曾认真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在贺熙龄、贺长龄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他的经世思想。左宗棠对林则徐、魏源都非常崇拜。后来他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可以说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具体实践。左宗棠自己也把这看作是龚、魏经世派在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主张的继承。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左与经世派思想的密切联系，以及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位洋务派先驱曾国藩（1811—1872），早年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学崇程、朱。鸦片战争后，又对古文经学发生兴趣，力主调和汉、宋，并吸取汉学中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正是他后来敢于正视现实的根源。他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思想日渐变化，由程、朱而求“经世之学”，提出儒学“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

学”，对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颇为推崇。可以看出，汉学家和理学家的一部分人，都在社会危机刺激下汇集到经世致用思潮中，为纠封建社会之“时弊”而寻找新的出路。

经世思潮，指的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然而，它的影响却不仅对洋务派，同时也延及维新派。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制定的《学约》里规定：“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经学仍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重视的一门学问。因此，维新派大多在面向西方的同时，往往把“经世致用”的儒学做为自己的思想前导。经世派的历史进化史观，“更法”的革新观念，“富民”的经济思想，都给维新派以直接的启迪，有的甚至直接利用他们的口号，而注入资产阶级内容。到康有为那里，便归结为“托古改制”，使经世思潮与资产阶级变法结合起来，并披上一层经学的外衣。不过，康有为的维新思潮毕竟不同于经世思潮，它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近代思想文化，仅仅把经学作为一种借用的形式，而其思潮文化的基础正是西学，虽然也揉合了中学，但毕竟后者不是主要的。从趋势看，经世思潮到这时期也逐渐淡化了。

经世思潮传播的同时，各种“经世文编”也先后出版，盛行于当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君子编印《皇明经世文编》之后，继有1826年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此后，按此体例及宗旨续编的经世文编，不下二十种。如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甘韩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于宝轩的《皇朝蓄艾文编》，以及民国初年的《民国经世文编》